

秦漢收律初探

陳中龍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漢代親屬連坐有三種，一是夷三族，二是族誅，三是收孥。三種涉及的罪行種類與刑罰的執行內容互不相同。收孥的特色在於連坐的親屬範圍不像夷三族那樣的廣，只限於正犯的妻子與兒女，而且正犯的罪刑也不必然是死刑，而是從完城旦、鬼薪以上到死刑之間。連坐的妻子與兒女也不像夷三族那樣要棄市，族誅那樣要徙邊，而只是將他們沒入官府為收人（官奴婢）。

收孥未見於出土資料，但張家山漢律有〈收律〉之名，兩者的關係未見學者討論。收孥最早見於《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變法時訂下收孥之規定，漢文帝元年(179 B.C.)才遭廢除。睡虎地秦律已有收之規定，爰及漢初已成〈收律〉之篇，故收孥與〈收律〉曾經同時存在。收孥之收者在人，〈收律〉之收者不但有人，還包括家中財物，此收孥與〈收律〉之最大差別。

《史記·孝文本紀》記文帝元年廢除收孥，廢除之後是否復行，引起兩方討論。從司法案例所見，終兩漢之世，收孥不再復行。只是魏晉時期，收孥的變相形式在某些規定中出現，這些規定被當時視為重典，希望能夠收到「累其心，使重犯法」的效果。

關鍵辭：收律、收孥、秦漢

* 本文於 2008.09.30.收稿，11.24.外審通過。

前言

漢代親屬連坐的種類有三種，一是夷三族，二是族誅（範圍以家為限），三是收孥。三種涉及的罪行種類與刑罰的執行內容互不相同，簡言之，夷三族的罪行種類多以軍事行動危害皇帝者為主，族誅的罪行則是排除軍事行動之外的重大罪行。夷三族是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族誅是正犯處以棄市，妻子與兒女徙邊¹。收孥雖然也是以家庭為對象，但是收孥的範圍、罪行的種類與刑罰的執行，明顯的與夷三族、族誅不同，因此必須與二者分開來說明。

「收孥」或作「收帑」。收孥（帑）一詞於前三史凡七見，分別在《史記》之〈秦始皇本紀〉、〈孝文本紀〉、〈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商君列傳〉，《漢書》之〈文帝紀〉、〈敘傳〉以及《後漢書·楊終列傳》，所記內容除〈商君列傳〉載商君在秦國的變法，〈秦始皇本紀〉記秦二世尚未廢除收孥之外，其餘的五個出處皆記漢文帝廢除收孥之事²。依據杜預的注，「帑」讀音為「奴」³，顏師古也注曰「帑讀曰孥」⁴，又《史記·孝文本紀》記文帝「除收帑諸相坐律令」⁵，〈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卻作為「除收孥相坐律」⁶，可見「帑」因讀為孥，兩字得以通假使用⁷。「收孥」與「收帑」未見於出土簡牘，不過張家山漢律卻有〈收律〉之名，共八枚簡，計五條律文。「收律」一詞於文獻僅見於《漢書·刑法志》，所言之事也是文帝廢除收孥之事，記為：「盡除收律相承坐法」⁸。〈收律〉雖只五條，但涉及收的原則、對象、罪刑等級、罪行種類以及收的條件，內容已經遠遠超越傳統文獻中收孥的範圍（只限於妻子與兒女），因此有必要對收律進行深一層的研究，尤其是收孥與收律的關係如何，

¹ 見筆者博士論文，《漢晉家族法制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5），第二章第一節至第三節。

² 另外《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百衲本），〈鼂錯傳〉，卷49，頁633云：「臯人亡帑。」顏師古注曰：「謂除收帑相坐律。亡讀曰無。帑讀曰孥。」

³ 《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十三經注疏本），卷第19，「文公六年」杜預注，頁315。

⁴ 《漢書·鼂錯傳》，卷49，頁633。

⁵ 《史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孝文本紀〉，卷10，頁154。

⁶ 《史記·孝文紀》，卷10，頁154。

⁷ 前三史中記為「收孥」者為《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除收孥相坐律」、〈商君列傳〉「舉以為收孥」，《漢書·敘傳》「臯不收孥」，《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楊終列傳〉「除去收孥」。記為「收帑」者為《史記·秦始皇本紀》「除去收帑污穢之罪」、〈孝文本紀〉「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漢書·文帝紀》「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⁸ 《漢書·刑法志》，卷23，頁242。其中「承」字為據敦煌文獻P.3669號《漢書·刑法志》殘卷所補。

目前還沒有學者研究，而關於〈收律〉本身也尚有討論的空間。

關於收孥的研究，學者多將其置於族刑的內容中一起討論，而與夷三族、族誅混為一談，最明顯的莫過於沈家本在《漢律摭遺》中的意見，他認為：

景帝之殺鼂錯，以大逆無道論，引律父母、妻子（案：沈氏文中缺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此律文尚有收孥之事。⁹

鼂錯所犯的是謀反的大逆無道罪，最後論以夷三族之刑，故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可是夷三族與收孥實為兩種不同的連坐範圍，將夷三族稱為收孥容易混淆彼此，造成誤解，可惜的是這種意見還存在於學術著作之中¹⁰。于振波利用睡虎地秦律研究收孥法的變遷，認為秦律是以罪刑等級作為收孥的條件，城旦舂以上的罪犯必須收孥，以下則免於收孥。同時他還再度證明收孥自漢文帝廢除之後不再施行¹¹。可惜的是于氏文中對於某些秦律的解讀似乎值得商榷¹²，而且當時張家山漢律尚未公佈，因此缺少〈收律〉這項直接史料。

對於〈收律〉的研究，目前尚屬起步階段，李均明利用張家山漢律研究〈收律〉與家族連坐，將兩者聯繫起來，這種做法已經說明〈收律〉的基本性質。同時他還依據主犯罪行的輕重，劃分了幾種家族連坐的範圍與程度，縱使這種劃分仍然屬於初步階段，但是已經擺脫將夷三族視作收孥的看法¹³。張伯元首次較全面的研究〈收律〉，尤其是將收孥與〈收律〉兩者一併討論，並比較

⁹ 沈家本，《漢律摭遺》；收入氏著《沈寄謬先生遺書》（北京：中國書店，1990），卷10，頁660。

¹⁰ 這種說法如比較早期的彭年，〈對於西漢收孥法研究中的兩個問題的商榷〉，《社會科學研究》，1987年第1期，頁69云：「西漢王朝對於謀反作亂、抗拒皇命諸種重大犯罪，除將罪犯本人殺戮外，往往還要施以收孥之罪，將其家屬沒入為官奴婢。」

¹¹ 見于振波，〈收孥法的變遷〉；收入《簡帛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第三輯，頁434-437。對於收孥的廢除與否，一般有兩種意見，其一是如班固所言，收孥並未廢除，繼續施行。其二是收孥廢除之後不再施行，例如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98），第Ⅲ編第二章〈漢の緣坐制—その廃止と變遷〉，頁249-255。文中作者特別舉出六個西漢的例子，證明收孥於文帝廢除後不再施行。

¹² 于振波，〈收孥法的變遷〉，頁434引〈法律答問〉第一七四號簡論證隸臣妾並不收孥，但該簡無涉於收孥。其它又引〈秦律雜抄〉第五號簡，〈法律答問〉第一〇九、一一〇號簡來證明鬼薪白粲的家屬也不在收孥之列，同樣的，這三簡律文也與收孥無關。另外，于氏文主張秦律收孥是針對城旦舂以上的罪犯，所列證據還有張家山漢律〈奏讞書〉的第十七個案例，雖然這個案例明確記載收孥一位城旦舂罪犯的妻子與兒女，但是這也只能證明城旦舂必須收孥，而無法證明鬼薪白粲不需收孥。

¹³ 李均明，〈張家山漢律《收律》與家族連坐〉；刊《文物》2002年第9期。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10-214。其中頁212云：「狹義的“收”，僅指沒收罪犯的妻子（或丈夫）、兒女及田宅、財產、奴婢等，史籍稱之為“收帑”。」將史籍的收帑直接以收來表達，即使是狹義的收，似乎也值得商榷。

秦漢律中的收，拓展了〈收律〉的研究範圍¹⁴。不過文中有幾點意見仍然可以討論，例如張氏認為「被收為官奴婢的，也就是“隸臣妾”」¹⁵，這種看法似乎要有更明確的證據來說明。本文將利用張家山漢律與睡虎地秦律的相關規定¹⁶，配合文獻的記載，希望能夠釐清收律的面貌及其內容，更盼各方專家賢達指正。

一、收孥與收律

收孥一詞，首見於《史記·商君列傳》，商鞅在秦國變法之時，規定：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司馬貞《索隱》曰：

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¹⁷

據司馬遷所記，商鞅變法所定的收孥對象是社會中的兩類人物，一類是「事末利」者，這類與「僇力本業，耕織致粟」者相對，故《索隱》認為是工商業者，應為不誤。另一類是「怠而貧者」，《周禮》謂之「罷民」，這類人與商鞅變法富國強民的目的相違背，故以法收孥之。商鞅施行收孥是變法的一部份，但文獻中對於收孥的內容卻無詳細的記載。商鞅的收孥是針對「事末利」與「怠而貧」這兩類人，不是因為犯罪遭判刑後的家屬連坐，故其施行的客體與漢初有

¹⁴ 張伯元，〈秦漢律中的“收律”考述〉，收入氏著《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121-139。

¹⁵ 張伯元，〈秦漢律中的“收律”考述〉，頁124。

¹⁶ 本文睡虎地秦律採用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張家山漢律採用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另外又加入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以下除了特殊狀況，不再寫出《睡虎地秦墓竹簡》與《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字樣。

¹⁷ 《史記·商君列傳》，卷68，頁758。

所差別。

所謂「收」者，《說文解字》云：「收，捕也。」如《詩經·瞻卬》云：「此宜無罪，汝反收之。」毛《傳》曰：「收，拘收也。」¹⁸然而「收」若只作「捕」解，其意尚未完全。「收」有「沒收」之意，指官府沒收罪犯的動作。「孥」者，《尚書·夏書》云：「予則孥戮汝。」孔《傳》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¹⁹《左傳·文公六年》亦云：「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駢送其帑。」杜預注曰：「帑，妻、子也。帑音奴。」²⁰可知孥指妻子與兒女，而收孥就是收捕、沒收罪犯的妻子與兒女。商鞅收孥「事未利」與「怠而貧」兩類人，意指將這兩類人的妻子與兒女收入官府，故知收孥的對象是「人」，並不包括家中的財物之類。

秦末仍行收孥，〈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

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²¹

司馬遷感嘆秦二世不廢除收孥，成為秦敗的原因之一，可見二世時仍行收孥。收孥自商鞅變法後施行，終秦之世未曾廢除，收孥之廢除在漢文帝元年(179 B.C.)。(廢除之事詳後)

收孥一詞不見於睡虎地秦律，但睡虎地秦律卻有數條律文牽涉收²²。《睡虎地秦墓竹簡》所見與收相關的律文，多集中在討論夫妻之間的法律關係，尤其是丈夫犯有竊盜罪之時，法律上要如何處置妻子的問題，顯示收是以家庭為範圍的法律規定。〈法律答問〉第一四號簡云：

夫盜千錢，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論妻？妻智（知）夫盜而匿之，當以

¹⁸ 《詩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十三經注疏本），卷第18，〈瞻卬〉，頁694。

¹⁹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卷第7，〈夏書〉，頁98。又《詩經·小雅》，頁323云「樂爾妻孥」，毛《傳》曰「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

²⁰ 《春秋左傳注疏》，卷第19，「傳六年」，頁315。

²¹ 《史記·秦始皇本紀》，卷6，頁101-102。

²² 睡虎地秦律還有「包」這樣的連坐名詞，〈法律答問〉云：「廷行事有罪當遷（遷），已斷已令，未行而死若亡，其所包當詣遷（遷）所。」又云：「嗇夫不以官爲事，以奸爲事，論可（何）毆（也）？當遷（遷）。遷（遷）者妻當包不當？不當包。」又云：「當遷（遷），其妻先自告，當包。」整理小組認為「包」是一種親屬連坐法，當罪犯被流放時，家屬也應隨往流放地點。可知「包」是家屬連坐的一種名稱，適用於遷刑的家屬，不過「包」並不是「收」的內容。

三百論為盜；不智（知），為收。²³

此條規定丈夫犯罪是否沒收妻子的問題。第一一六號簡云：

隸臣妾將城旦，亡之，完為城旦，收其外妻、子。²⁴

此條規定隸臣妾再犯罪而收其妻子與兒女的問題。第一七〇號簡云：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贖（媵）臣妾、衣器當收不當？不當收。²⁵

此條規定不收妻贖（媵）臣妾與衣器，但反面思考，若妻不主動先告，則當收妻贖（媵）臣妾與衣器。因此，由睡虎地秦律得知，收的對象包括「人」與「物」，而收孥只涵蓋「人」而已，這是收與收孥最大的差別。

收孥存在於商鞅變法後到漢文帝之間，而睡虎地秦律已見收之規定，張家山漢律又有〈收律〉，顯然收孥與收兩者並存一段時間，那麼這兩者的關係為何呢？從時間上而言，收孥較早出現，對於「孥」的連坐，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而且連坐理當先收人，因為目標明確而且容易達到效果。從執行上而言，先收人也較簡易，收物必須有查封與監管的配合，因此，有關收的規定，最早出現的是對人的收，再由對人擴大到對物的收，在名稱上的演變便是由「收孥」到「收」的過程，這段過程剛好就是睡虎地秦律存在的時間，也就是收孥與收的並存時間。從範圍上來說，較早出現的收孥只涉及人，最後變成〈收律〉的一部分，甚至到了漢文帝時已將它廢除。

二、收的條件

張家山漢律〈二年律令〉已經有一專門的律——「收律」，表示收的相關規定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因此在律令體系中成為一個主體。關於〈二年律令〉的時間，整理小組依據出土的〈曆譜〉以及〈具律〉中出現「呂宣王」一詞，

²³ 〈法律答問〉，第一四號簡，圖版頁 50，釋文頁 97。

²⁴ 〈法律答問〉，第一一六號簡，圖版頁 58，釋文頁 121。

²⁵ 〈法律答問〉，第一七〇號簡，圖版頁 63，釋文頁 133。

「呂宣王」爲呂后元年(187 B.C.)追尊后父之稱號，故推測「二年」當指呂后二年，因此〈二年律令〉所記的就是漢初的律文。若以呂后二年爲斷限，上距睡虎地秦律，其間只三十餘年²⁶，時間雖短，卻已改朝換代，因此利用這兩批資料正好可以說明秦漢之際律文的演變及其承襲關係。

(一) 收的原則性規定

〈二年律令·收律〉編號爲第一七四至一八一號簡，共計五條律文。其中第一七九號簡爲收律的原則性律文，其云：

當收者，令獄史與官嗇夫、吏襍封之，上其物數縣廷，以臨計。²⁷

有罪當收者，由官吏查封所收的物品與人員，上報縣廷統計監管之。這樣的做法類似睡虎地秦律〈封診式·封守〉條所記，封守時必須查封罪犯的妻子與家室財產。〈收律〉所見，查封被收者的家室，應由縣廷派遣官吏執行，縣廷扮演查封者的執行角色，不過從〈封守〉條來看，查封罪犯的執行者是鄉中的官吏，而且查封完畢還要訊問罪犯所屬的典正與同伍之人，故而在查封的過程上，〈封守〉條反映的更較〈收律〉的規定來得嚴格與縝密。另外一條原則性規定記載在第一七八號簡，簡文云：

有罪當收，獄未決而以賞除罪者，收之。²⁸

當罪刑達到收的標準，雖然在訴訟過程中因獎賞而得以免罪，但是卻不能免除收的處罰。

(二) 「當收」與「毋收」

據〈收律〉規定，收的條件並不單純，其中第一七四至一七五號簡所記，乃針對「當收」與「勿收」者的區別，律文云：

²⁶ 此處睡虎地秦律的時間，以〈編年紀〉的最後一年秦始皇三十年(217 B.C.)爲斷，故距呂后二年(186 B.C.)爲31年。

²⁷ 〈二年律令·收律〉，第一七九號簡，圖版頁21，釋文頁157。

²⁸ 〈二年律令·收律〉，第一七八號簡，圖版頁21，釋文頁157。

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財、田、宅。其子有妻、夫，若為戶、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為人妻而棄、寡者，皆勿收。坐奸、略妻及傷其妻以收，毋收其妻。²⁹

文獻中從未見到有關當收標準的記載，商鞅變法時曾對兩類人執行收孥，似乎收孥的標準是以罪行種類為原則，但應劭注解《史記》記載廢除收孥之時云：「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³⁰，似乎秦時只要犯法便需收孥，收孥並無任何的標準與條件。但是從上引〈收律〉可以明確得知，收孥的條件有二，一是以達到某罪刑以上為標準，二是以罪刑種類為標準。前者所指是罪人必須論刑完城旦、鬼薪以上，後者所指是因姦罪而論以腐刑者，可見應劭的解釋實在過於籠統。

1. 「當收」的罪刑標準。在罪刑標準上，秦律已經透露這樣的規定，〈法律答問〉云：

- (1) 隸臣將城旦，亡之，完為城旦，收其外妻、子。
- (2) 甲殺人，不覺，今甲病死已葬，人乃後告甲，甲殺人審，問甲當論及收不當？告不聽。³¹

由第(1)條引文得知，當罪刑達到完為城旦便收其妻子與兒女，這項規定與〈收律〉一樣。由第(2)條得知，雖然犯罪行為人甲已經身亡而不追究其罪刑，但是從問答的語意可以確定，若甲未身故，便要收甲的家人。因此，就目前資料所見，秦的收也是以罪刑為標準，完城旦以上到死刑都要收。

秦律的罪刑標準是完為城旦，而〈收律〉卻記為「完城旦、鬼薪以上」，似乎漢初加了鬼薪一項。然而，若查漢初的〈具律〉規定：「贖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兩」³²，可知在贖刑的系列裡，城旦舂與鬼薪白粲屬於同一個等級，並無程度上的區別，因此〈收律〉的規定也就沒有模糊之處了。于振波根據睡虎地秦律推測，認為秦律的收並非針對所有的罪犯，而是要依據犯罪的

²⁹ 〈二年律令·收律〉，第一七四至一七五號簡，圖版頁 21，釋文頁 153。據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的意見，「罪人完城旦」後無「舂」字，今從之。見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59。

³⁰ 《史記·孝文本紀》，卷 10，頁 154。

³¹ 〈法律答問〉，第六七號簡，圖版頁 54，釋文頁 109，。

³² 彭浩等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具律〉第一一九號簡，釋文頁 140。

類別與量刑的等級來使用，這個意見已經得到〈收律〉的證實，不過秦律是否將收的罪刑訂在城旦舂以上，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證據。透過秦律，只能確定完為城旦以上必須收其妻子與兒女，秦律中的鬼薪是否也如漢初一樣同屬於一個刑等，現在還無法確定。

2. 「當收」的罪刑種類。在罪刑種類方面，〈收律〉只記載一項，即「坐奸府（腐）者」，這裡特別強調是因奸罪而受腐刑者。〈二年律令·襍律〉規定：

諸與人妻和奸，及其所與皆完為城旦舂。其吏也，以強奸論之。³³

和奸的罪刑是完為城旦舂，強奸的罪刑肯定重於和奸，〈襍律〉又云：

強與人奸者，府（腐）以為宮隸臣。

故知府（腐）以為宮隸臣的刑等重於完為城旦舂。漢初奸罪中，只有強奸罪一項被論以腐刑，此外，又因加重官吏的和奸罪，也依強奸罪論刑³⁴，故奸罪而受腐者，只有這兩種情況，而這兩種都是「當收」的罪行。另外，據張家山漢律的規定，贖城旦舂、鬼薪白粲須金一金八兩，而贖腐只要一金四兩，贖腐的金額比贖城旦舂、鬼薪白粲要少，而且隸臣的刑等也在完城旦舂之下，可是將腐與隸臣複合在一起而成為腐以為（宮）隸臣時，卻又是重於完城旦舂的刑等，可見漢初的刑等還在混亂的階段。

3. 「毋收」的條件。據〈收律〉記載，某些情況下可以完全或個別的免收，第一是「其子有妻、夫，若為戶、有爵」，即當兒女都已嫁娶，而且各自成立戶籍，有爵位者，得完全免收。由此亦可知，收的對象傾向於同一戶籍的成員。第二是「年十七以上，若為人妻而棄、寡者」，即女兒年紀超過十七歲，且曾經嫁為人妻，但遭棄婦或老而無夫者，亦得完全免收。棄婦與寡者都是結束婚姻關係之人，自然能免除來自於丈夫引起的收。第三是「坐奸、略妻及傷其妻以收，毋收其妻」，這是針對妻子個人的免收。此項又包括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丈夫因奸罪而論以完城旦以上時，可以不沒收妻子。漢初奸

³³ 〈二年律令·襍律〉，第一九二號簡，圖版頁 23，釋文頁 159。

³⁴ 〈二年律令·襍律〉，第一九三號簡，釋文頁 159 云：「強與人奸者，府（腐）以為宮隸臣。」第一九二號簡云：「諸與人妻和奸，及其所與皆完城旦舂。其吏也，以強奸論之。」

罪區分為三種，一是普通奸罪，罪刑是耐為隸臣妾³⁵。二是與人妻和奸罪，罪刑是完為城旦舂，三是強奸罪，罪刑是腐以為宮隸臣。這三種奸罪中，和奸與強奸的罪刑都在完城旦以上，依〈收律〉必須收其妻子，但是律文特別排除這兩種奸罪對於妻子的沒收。可是前文已指出，律文將「坐奸府（腐）者」——即強奸罪直接列入「當收」之中，因此事實上因奸罪而「毋收其妻」的情況只有和奸一種。至於和奸為何可以「毋收其妻」，強奸卻要一併沒收妻子，主要的原因是考慮到丈夫的和奸犯意已經侵害妻子，而強奸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第二種情況是「略妻」得以「毋收其妻」。「略妻」應該是「強略人以為妻」的省稱。〈襍律〉規定：

強略人以為妻及助者，斬左止（趾）以為城旦。³⁶

所謂「強」者，不和也³⁷，故知「強」與「和」為相對詞。強略人以為妻及其協助者，皆論以「斬左止以為城旦」，這項刑罰遠高於完城旦。而且，若所略者為他人之妻，其罰更重，如漢武帝元光五年(130 B.C.)，曲逆獻侯陳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³⁸。強略人以為妻同樣是侵犯妻子權益的行為，因此雖然罪刑達到當收的標準，卻可以「毋收其妻」。

第三種情況是「傷其妻以收」，得「毋收其妻」，即丈夫打傷妻子而罪刑達到當收的標準，可以不沒收妻子。〈二年律令·賊律〉規定：

妻悍而夫毆笞之，非以兵刃也，雖傷之，毋罪。³⁹

在妻悍的情況下，丈夫未持兵刃毆打妻子，可以不論罪。〈賊律〉又云：

鬪而以釧（刀）及金鐵銳、錘、棒（錐）傷人，皆完為城旦舂。⁴⁰

³⁵ 〈奏讞書〉，第一八二至一八三號簡，圖版頁 68，釋文頁 227 云：「奸者，耐為隸臣妾」。

³⁶ 〈二年律令·襍律〉，第一九四號簡，圖版頁 23，釋文頁 159。

³⁷ 《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刑法志〉，卷 30，頁 239。

³⁸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卷 18，頁 273。

³⁹ 〈二年律令·賊律〉，第三二號簡，圖版頁 9，釋文頁 139。

⁴⁰ 〈二年律令·賊律〉，第二七號簡，圖版頁 9，釋文頁 138。

一般以兵刃鐵錐器物傷人者，論以完爲城旦舂，已經達到當收的標準。以秦律而論，夫因妻悍而毆打使其傷耳、四肢及身體者，所論之罪與一般鬥毆撕裂他人耳朵相同，即丈夫以兵刃傷妻並沒有減刑。若漢代也是如此，則丈夫以兵刃傷妻也應論以完城旦舂，此時，因妻子是受害者，自然不在當收之列。

4. 夫妻間的「毋收」。夫妻之間若已知對方的犯罪行爲而主動先行告發者，得毋收之。〈收律〉云：

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論；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⁴¹

在獎勵告發的前提下，丈夫或妻子先告發對方的罪行，皆可免於收律的處分，這項規定無疑的來自於秦朝。〈法律答問〉云：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贖（媵）臣妾、衣器當收不當？不當收。

不收妻子與妻子的陪嫁奴婢、衣物的原因，在於妻子先告發丈夫的罪行。

5. 兒女的「毋收」。在某些特殊狀況下，可以毋收兒女。〈收律〉云：

• 毋夫，及為人偏妻，為戶若別居不同數者，有罪完舂、白粲以上收之，毋收其子。內孫毋為夫收。⁴²

律文中的「完舂」應為「完爲城旦舂」的縮寫，「白粲」則與「鬼薪」等級相同，只是白粲為女犯所服，鬼薪為男犯所服。這條律文的重點在於後面的「毋收其子」一事，在「毋夫」與「為人偏妻」而又別居另立戶籍的情況下，可免收其兒女。別居而獨自申立戶籍，當是免收兒女的主要原因，目的是在維持戶籍的延續不絕。

6. 奴的「毋收」。對於奴也有特別的規定，〈收律〉云：

奴有罪，毋收其妻子為奴婢者。有告劾未還死，收之。匿收，與盜同法。

⁴¹ 〈二年律令·收律〉，第一七六號簡，圖版頁 21，釋文頁 157。

⁴² 〈二年律令·收律〉，第一七六至一七七號簡，圖版頁 21，釋文頁 157。

對於收奴的標準，是否也依照一般情況，目前無法確定。律文只云奴有罪，不言罪刑的高低。而且，此條不易理解，對於條文中的「還」字，學者有不同的解釋⁴⁴。筆者認為，此「還」字還是解作「至」、「到」為宜，其句義可為：奴有罪，不沒收已經身為奴婢的妻子與兒女。但是對於非奴婢的妻子與兒女，奴的罪未達到死刑時，必須收之，言外之意表示奴有死罪時，可以不收其妻子與兒女。可見社會階級也會影響〈收律〉的執行。

綜觀收的條件，可知並非適用於所有的罪犯，其中量刑的等級為收的主要條件，不過影響收的因素眾多，無法以單一條件來解釋。

三、收的對象與範圍

據〈收律〉規定，「收」的對象有兩類，一是家中成員，二是家中財物與田宅。睡虎地秦律〈封診式·封守〉條云：

鄉某爰書：以某縣丞某書，封有鞠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產。•甲室、人：一字二內，各有戶，內室皆瓦蓋，木大具，門桑十木。•妻曰某，亡，不會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幾訊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甲黨（倘）有【它】當封守而某等脫弗占書，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無）它當封者。」即以甲封付某等，與里人更守之，侍（待）令。⁴⁵

〈封守〉條的內容是對有罪者家室與財產的查封，雖然沒有指明是對被收者的處置，但是查封的過程與內容仍具參考性。從〈封守〉條得知，查封的內容包

⁴³ 〈二年律令·收律〉，第一八〇號簡，圖版頁 22，釋文頁 157。

⁴⁴ 張伯元，〈漢簡法律術語零拾（四則）〉；收入氏著《出土法律文獻研究》，頁 223-224 將此條中的「還」解釋為「拘捕」的意思，整段的意義是：「告劾後未拘捕得死罪者；因為奴死罪，妻、子無所依，所以收之；與上半句相聯繫，即使“其妻、子為奴婢者”，也收。」但是「未拘捕得死罪者」一句，仍然是難以解釋。

⁴⁵ 〈封診式·封守〉，第八至一二號簡，圖版頁 69，釋文頁 149。

括有罪者的家庭成員——妻子與兒女，還有臣妾、家室、衣器、畜產等財產。查封完畢後還要做確認工作，並派人看守。這些過程顯示秦時對查封事項要求相當嚴格。漢初也承襲這種做法，〈收律〉云：

當收者，令獄史與官嗇夫、吏祿封之，上其物數縣廷，以臨計。

坐律收者由縣獄史與主管的嗇夫、吏員將所收之物與人的細目，上於縣廷。條文中的「物」當指沒收的財物之類，「數」則指所收之人的名數，而縣廷成為查封財物與人員後的處理單位。

（一）、家中成員的收

沒收的家庭成員到底包括哪些人呢？司馬貞索隱云「收錄其妻、子」，秦律亦云「收其外妻、子」，顯然妻與子都是當收之人；其中的「子」，包括兒子與女兒。又從張家山漢律的五條〈收律〉來看，遭收的親屬全部都是妻子與兒女，從未超過這個範圍。〈收律〉第一七七號簡甚至云：「內孫毋為夫收。」⁴⁶可知當收所及不包括自己的第三代子孫。當收的家庭成員，只包括妻子與兒女，收是一種執行於核心家庭之內的連坐法，在血緣關係上並不涉及父母、同產或是孫子。而且從相關規定來看，遭收的兒女也多以未婚在家者為主，已婚而另立戶籍者，通常可以被排除在當收之外。

1. 夫妻間的收。從睡虎地秦律得知，收主要用於丈夫犯罪而沒收妻子、兒女及家產的規定，正犯是丈夫，收的對象是妻子與兒女。但是相反過來，妻子犯罪而丈夫與兒女是否也要收呢？〈收律〉云：

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論；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

本條為鼓勵告發而設，妻子主動告發夫罪而能獲得免收。律文規定妻子得「除于收及論」，其中的「收」當指免收，「論」則指妻若參與犯罪，也能藉此自告而免除其罪⁴⁷。相反的，丈夫告發妻子的罪行，也能免除丈夫參與犯案之罪，

⁴⁶ 〈二年律令·收律〉，第一七六至一七七號簡，圖版頁 21，釋文頁 157。

⁴⁷ 張伯元，〈秦漢律中的“收律”考述〉，頁 131。

同時免收。可見夫妻告發對方之罪行，都能免除收之連坐。

2. 兒女的收。關於兒女的收，是否有最低年齡的限制？〈法律答問〉云：

隸臣妾將城旦，亡之，完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別，令從母為收。・可（何）謂「從母為收」？人固買（賣），子小不可別，弗買（賣）子母謂毆（也）。⁴⁸

遭收的子因為年齡過小而無法離開母親，必須與母親一同賣掉，稱為「從母為收」。〈二年律令・具律〉規定：

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⁴⁹

漢初使用肉刑的開始年齡是十七歲，十七歲成為法制上的成年人⁵⁰，但是遭收之人並不受肉刑，因此不能以十七歲做為當收的最低年齡。而且，即使十七歲以下只能以完取代肉刑，可是完仍然是一種刑罰，不能表示十七歲以下就可完全免除刑罰論處。秦律既然有「從母為收」的規定，那麼兒女的收似乎就沒有最低年齡的限制。

3. 特殊的因母而收。因母而收的情況，目前尚無法清楚理解，〈收律〉云：

・毋夫，及為人偏妻，為戶若別居不同數者，有罪完舂、白繁以上收之，毋收其子。內孫毋為夫收。

「毋夫」與「為人偏妻」者在別居另立戶籍的情況下，犯罪達到收的標準，仍然要沒入官府，但是不需沒收其兒女。其「毋收其子」的主要原因，在於另立戶籍，因此若未另立戶籍，可能就沒有這樣的優待。不過，這只是就此條律文的推測而已。

⁴⁸ 〈法律答問〉，第一一六號簡，圖版頁 58，釋文頁 121。

⁴⁹ 〈具律〉第八三號簡，圖版頁 13，釋文頁 146。

⁵⁰ 角谷常子，〈秦漢時代における家族の連坐について〉；收入富谷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6），頁 175。

4. 「收人」的處置。丈夫的罪刑已達到收的標準，那麼所收的妻子、兒女要如何處置？就犯罪主體而言，因丈夫是正犯，故依律以本罪論處，但妻子與兒女是基於連坐的規定，本身並未觸法，所以被收的妻子、兒女與丈夫會有不同的處罰。司馬貞《索隱》云：「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罪犯的妻子與兒女以沒入官奴婢做為處罰。《朱子語類》亦云：

通鑑：「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拏。」謂收之為奴婢，不得比良民。有罪，則民得以告之官而自殺之。⁵¹

朱熹之意指貶低罪犯妻子與兒女的社會階級，使其變為私人奴婢，但是不沒入官府，否則有罪而「民何得以告官自殺之」？在張家山漢律的〈奏讞書〉中，記載一位名為「講」的乞鞠案例。講為「樂人」，於漢高祖元年(206 B.C.)十二月被雍縣判為「與人謀盜牛」，論講鯨為城旦。二年十月，講順利乞鞠成功，獲判不盜牛⁵²。講原來被判為鯨城旦，罪刑重於完城旦，所以講的妻子與兒女皆沒入為官奴婢。簡文云：

妻、子已賣者，縣官為贖。它收已賣，以賈（價）畀之；及除坐者貲，貲□人環（返）之。⁵³

可知被收的妻子與兒女在沒入為官奴婢後，就被官府賣給私人；而且沒收的財物，通常也轉賣給私人。因此講乞鞠成功後，才由官府贖回他的妻子與兒女，並以同等價錢賠償沒收的財物。這種做法也源於秦代⁵⁴。

文獻所見，收人皆沒入為（官）奴婢，但〈奏讞書〉已見將收人賣給私家做奴婢之例，〈二年律令·金布律〉又云：

縣官器敝不可繕者，賣之。諸收人，皆入以為隸臣妾。

⁵¹（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34，〈歷代一〉，頁3205。

⁵²〈奏讞書〉，第九九至一二三號簡，圖版頁61至63，釋文頁221至222。

⁵³〈奏讞書〉，第一二二至一二三號簡，圖版頁63，釋文頁222，

⁵⁴〈法律答問〉云：「隸臣將城旦，亡之，完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別，令從母為收。•可（何）謂『從母為收』？人固買（賣），子小不可別，弗買（賣）子母謂毆（也）。」據整理小組解釋：隸臣論以完城旦之後，必須收其妻子、兒女，而且兩者都要轉賣給他人，但是若兒女的年紀太小，無法離開母親，就不要單獨的將母親賣掉，言下之意表示，遭收的妻子、兒女都將被轉賣給他人。

整理小組認為，「諸收人」以下當為誤抄入此⁵⁵。整理小組的判斷依據當以「諸收人」以下的規定與前段渺無關係，故主張誤抄所致。這種意見不無可議之處，故有學者並不贊同，而逕將「諸收人」以下解釋為處置收人的方法，即被收後直接沒入為隸臣妾⁵⁶。筆者認為，此簡「諸收人」以下並非誤抄，但是，收人也不是一開始就沒入為隸臣妾。先從律文來看，前面是記載縣官器物損壞不可修繕者，可以將它賣掉，後段則是針對收人而來，原本收人也要像〈奏讞書〉中「講」的家人一樣，沒入為官奴婢後賣給私人，但是〈金布律〉做了不同的規定，反而將收人沒入為隸臣妾。〈金布律〉作此規定，可能是原本要賣出的收人，因某種原因無法賣出，才會將這些收人沒入為隸臣妾。此條內容原都是與販賣縣官財物有關，故「諸收人」以下不為誤抄。

其次，收人與隸臣妾常常併稱，可見兩者不同，但性質卻又類似。併稱始見於秦律，〈秦律十八種〉云：

道官相輸隸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稟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無）有。
受者以律續食衣之。 屬邦⁵⁷

在〈屬邦〉中規定，道官輸送隸臣妾與收人時，必須記載給稟日期。漢初的〈亡律〉也云：

隸臣妾、收人亡，盈卒歲，**𡗗**（繫）城旦舂六歲；不盈卒歲，**𡗗**（繫）三歲。⁵⁸

此條規定隸臣妾與收人逃亡的加重刑責相同。收人與隸臣妾常併稱使用，可知是兩類人，但是這兩類人的身分性質又差不多，因此〈金布律〉才會規定直接將未賣出的收人沒入為隸臣妾。出土簡牘以「收人」稱呼被收者，其地位類似於隸臣妾，收人的實際情況如何，目前無法詳細說明，不過將收人賣給私家為

⁵⁵ 〈二年律令·金布律〉，第四三五號簡，圖版頁 43，釋文頁 191。

⁵⁶ 張伯元，〈秦漢律中的“收律”考述〉，頁 127 的標題（一）為：「收人是隸臣妾，是官奴婢，而私奴婢專指私人奴婢。」張文主張收人是隸臣妾的主要依據，就是〈金布律〉中「諸收人，皆入以為隸臣妾」的記載。

⁵⁷ 〈秦律十八種〉，第二〇一號簡，圖版頁 31，釋文頁 65。

⁵⁸ 〈二年律令·亡律〉，第一六五號簡，釋文頁 155。另外，〈亡律〉一七〇號簡也云：「完城旦舂罪以下到耐罪，及亡收、隸臣妾、奴婢及亡盈十二月以上，贖耐」。收人還是與隸臣妾併稱。

奴婢，應是對收人的處置原則。

（二）、家中財物的收

除了人的收外，財物也在沒收之列，〈收律〉規定收其「財、田、宅」即是。財的範圍如何，〈封守〉條查封的有臣妾、衣器與畜產。〈法律答問〉規定：

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贖（媵）臣妾、衣器當收不當？不當收。

在妻子舉發丈夫罪行的條件下，妻子的陪嫁臣妾、衣物不須沒收，此乃「臣妾」、「衣器」之類。〈二年律令·置後律〉云：

女子為父母後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棄妻，及夫死，妻得復取以為戶。棄妻，畀之其財。⁵⁹

女兒出嫁時已經繼承本家田宅，到了夫家之後，繼承的田宅必須登記在丈夫的名下，而且若無棄妻或夫死的情況，這項規定將持續下去。在婚姻狀態持續之下，妻子的陪嫁奴婢與衣物，都屬於丈夫名下所有⁶⁰，當丈夫犯罪時，也是被沒收的標的，秦律之所以規定不須沒收，是對妻子告發丈夫的優惠。故〈法律答問〉又云：

妻有罪以收，妻贖（媵）臣妾、衣器當收，且畀夫？畀夫。⁶¹

妻子有罪沒入官府，她的陪嫁臣妾與衣器，不須沒收，而是要給丈夫。顯然在婚姻關係持續之下，這些臣妾、衣器都屬於丈夫所有。不過，收人的財物被沒收之後，以賣給私人為原則，就如〈奏讞書〉中沒收「講」的財物的一樣。

秦漢政府常以沒收罪人與其財物做為懲罰手段，文獻與出土資料多以「沒入」稱之，指人沒入為官奴婢，財沒入為公家錢財。不過「沒入」不是用來專

⁵⁹ 〈二年律令·置後律〉，第三八四號簡，圖版頁 39，釋文頁 184。

⁶⁰ 〈法律答問〉，第一七一號簡云：「妻有罪以收，妻贖（媵）臣妾、衣器當收，且畀夫？畀夫。」在這種情況之下，妻的陪嫁物尚且要交給丈夫，在平時，陪嫁物當然屬於丈夫。

⁶¹ 〈法律答問〉，第一七一號簡，圖版頁 63，釋文頁 133。

稱收律的執行，如漢武帝行告緡錢，沒入「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⁶²，「沒入」雖然是一種官府行爲，卻不能等同於收律的法律行爲⁶³。

收以沒入爲收人做爲懲罰，這種方法是以降低其社會階級爲目的，但是絕不能將收人視爲刑徒。〈二年律令·盜律〉云：

劫人、謀劫人求錢財，雖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爲城旦舂。其妻子當坐者徧（徧）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⁶⁴

對於綁架或預謀綁架勒索錢財者，雖然沒有獲得財物，仍要論以磔刑，並罪其妻子與兒女。律文中不用「收其妻、子」而用「罪其妻、子」，顯示妻子與兒女也變成罪犯，而且還要論爲城旦舂。此條中，磔刑爲死刑之一，已達到當收的標準，但是妻子與兒女卻沒有沒入爲收人，可見此條不適用收律。漢律之所以這樣規定，是特別加重「劫人」者的罪刑所致⁶⁵，使其妻子、兒女也變成刑徒，在社會階級上，更下官奴婢一等。但收人大概是類似於隸臣妾的地位，並且以賣給私人爲常，它並不是刑徒。

四、收孥的廢除

廢除收孥的記載最早見於《史記·孝文本紀》，其云：

（孝文元年）十二月，……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⁶⁶

此外，〈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云「除收孥相坐律」⁶⁷，《漢書·文帝紀》云

⁶² 《史記·平準書》，卷 30，頁 453。

⁶³ 于振波，〈收孥法的變遷〉，頁 436 引《後漢書·殤帝紀》延平元年詔「宗室坐事沒入者」，認爲此處的「沒入」即是因收孥而沒入，將沒入等同收孥，似乎可議。

⁶⁴ 〈二年律令·盜律〉，第六八至六九號簡，圖版頁 12，釋文頁 144。

⁶⁵ 程樹德，《九朝律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卷 4「梁律考」，頁 317 云：「劫身皆斬，妻子補兵，則沿襲晉宋舊制也。」《隋書·刑法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卷 25，頁 340 記梁律云：「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贍面爲劫字，髡鉗，補治鎖土終身。」可見南朝時期劫身之罪仍較其他罪行爲重。

⁶⁶ 《史記·孝文紀》，卷 10，頁 154。

⁶⁷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卷 22，頁 344。

「盡除收帑相坐律令」⁶⁸，〈敘傳〉云「皐不收孥」⁶⁹，《後漢書·楊終傳》云「除去收孥」⁷⁰。但是《漢書·刑法志》卻記爲：

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承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⁷¹

又〈刑法志〉將此事繫於孝文二年，是為誤置⁷²，應該在元年。

《史記》與《漢書》皆記收孥已於文帝之世廢除，但是對於廢除後的情況，不少人認為收孥並未如實的廢棄不用，最早提出這種意見的是後漢的班固。如上所引，班固舉新垣平夷三族之例，認為收孥未廢除。還有清末的沈家本，從蒐集的十幾個案例中發現，收孥未在文帝元年之後消失無蹤⁷³。產生這樣的矛盾，到底是收孥未如實廢除，還是執法官吏的疏失，或是一般對於《史記》所載收孥的廢除有所誤解。基於此，重新檢討史料成為首要工作。據上引《史記·孝文本紀》所載，文帝對於當時的親屬連坐提出異議，他憂慮的是：「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事實上，這裡面包括了兩種刑罰範圍，一是「父母、妻子、同產坐之」，二是「收孥」，這兩種連坐方式在引文中分別以「坐之」⁷⁴和「收孥」表現出來。對於「坐之」的範圍已經清楚的表達為「父母、妻子、同產」，很明顯的這就是「夷三族」的親屬範圍。另外，從本文得知，收孥的對象只限於妻子與兒女，這個範圍包括在「父母、妻子、同產」之內，因此文帝不再刻意的指出它的範圍。

經過文帝與有司的討論，最後達成定案，廢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此舉表示刪除的親屬連坐，只有收孥一項，而不是將「夷三族」與「收孥」兩者都一併廢除不用⁷⁵。只是對於「收帑諸相坐律令」這句話，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廢除的也包括夷三族在內。尤其是新校本的《漢書·刑法志》，將「盡除

⁶⁸ 《漢書·文帝紀》，卷4，頁36。

⁶⁹ 《漢書·敘傳下》，卷100，頁1310。

⁷⁰ 《後漢書·楊終傳》，卷48，頁722。

⁷¹ 《漢書·刑法志》，卷23，頁242。其中「承」字為據敦煌文獻P.3669號《漢書·刑法志》殘卷所補。

⁷² 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卷23，頁507轉引錢大昕語。

⁷³ 沈家本《漢律摭遺》，卷10，頁659至660。

⁷⁴ 「坐」作為司法用語時，有「入罪」之意，見李調元，《勦說》（臺北：世界書局，1982），頁32。還有「連坐」之意，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效律》，第一七號簡云「同官而各有主殿（也），各坐其所主」，此「坐」指職務之連坐。漢文帝云「父母、妻子、同產坐之」，也是指連坐之意。

⁷⁵ 高恒〈西漢王朝前期的法制改革〉，收入氏著《秦漢法制論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頁150中已有簡論。

收律相坐法」斷為「盡除收律、相坐法」⁷⁶，使原本只是一件事情，因標點錯誤而變成兩件事情。〈刑法志〉對此事作「收律相 坐法」，表達方式更優於《史記》，因為它直接以「收律」稱之，與張家山漢律所見相同。又〈收律〉本來就牽涉連坐，因此稱「相承坐」也是合情合理。

文帝之世有新垣平案，案發距廢除收孥僅十七年，班固、沈家本都以爲此案復行收孥，沈家本甚至爲此事尋找理由，認為「其事或別有情形，史不能具」。實際上新垣平所犯屬「謀爲逆」之罪⁷⁷，原本就是夷三族的重罪。又如景帝之殺鼂錯，以「大逆無道」論之⁷⁸，同樣屬於「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的夷三族。其它又如「祝詛」、「巫蠱」、「大逆」、「謀反」等罪名，都屬於「族刑」的罪名⁷⁹，其連坐範圍原本就超過收孥，而且刑罰內容也重於收孥。因此不能將觸犯這些罪名而產生的連坐與收孥相互混淆，若沒有劃分清楚，很容易將坐收父母或同產的案例，也作為未廢除收孥的例證。

在親屬連坐的規定中，因不同的條件而產生不同的連坐範圍，以軍事行動威脅皇帝，必須夷三族——「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非以軍事行動威脅皇帝的大逆無道，必須族誅——「正犯棄市，妻子與兒女徙邊」；完城旦舂、鬼薪以上的罪刑，必須沒收妻子與兒女爲收人。這是三個不同層次的親屬連坐⁸⁰。沈家本云：

似漢初雖未全襲秦舊，而罪之當收孥者，不止大逆無道一條，文帝先盡除之。新垣平之獄必不得已而用重法，而大逆無道一條遂復施行。故景帝亦仍用之耳。至相坐之法與收孥本不同條。⁸¹

沈家本以爲大逆無道的連坐包括在收孥之內，而且不論是大逆無道或是收孥，在文帝時就已全數廢除，日後復行大逆無道一條，遂使大逆無道與收孥相互分

⁷⁶ 新校本《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刑法志〉，卷 23，頁 1104。

⁷⁷ 《漢書·刑法志》，卷 23，頁 242。

⁷⁸ 《漢書·鼂錯傳》，卷 49，頁 635。

⁷⁹ 參見陳乃華，〈秦漢族刑考〉；《山東師範大學學報》，1985 年第 4 期，頁 37 至 41。

⁸⁰ 于豪亮，〈從雲夢秦簡看西漢對法律的改革〉；收入氏著《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50 中也認為西漢並未廢除連坐法，仍實行族誅，但是卻廢除了收孥。這樣的意見已經隱喻族誅與收孥是兩種不同的連坐概念。但是沈欽韓《漢書補注》在解釋孝文帝廢除收孥時，卻云：「坐者核其輕重，減本人一等、二等也。收者無少長皆棄市。」關於沈氏的說明，並未解決相坐與收孥的問題，反而是讓問題更模糊了。

⁸¹ 沈家本，《漢律摭遺》，卷 10，頁 660。

開。實則自漢以來大逆無道與收孥就各成體系，只是它們都屬於親屬連坐規定，容易讓人產生混淆而已。大逆無道必須論及族刑，漢律中從來沒有廢除過，因此根本不須說「復行」夷三族之事。

于豪亮認為：「收孥法自漢文帝宣佈廢除以後，直到西漢末期始終沒有再執行過。」但是新莽與後漢都恢復了沒為官奴婢的法律⁸²。他認為王莽恢復收孥的根據如下：

（王莽時）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⁸³

此為天鳳六年(19)所作的規定。這段文意該解作：「私自鑄造泉布的人，將與他的妻子、兒女一同沒入為官奴婢。」很明顯的，正犯與其妻子、兒女一起沒入為官奴婢，這種方法並非漢初收孥的規定，若說此法能與收孥牽扯上關係，也只有妻子、兒女連坐一項。而且，王莽此法屬於一時重典，光武之世就被廢除了⁸⁴。這種短暫而變相的收孥方式，也發生在三國以後的時期，《三國志》云：「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⁸⁵ 實際的案例如：

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

86

曹魏之時對於在營軍士的逃亡者，加重至收其妻子、兒女為官奴婢。這也是一時的嚴懲，西晉之初制定泰始律時，就將它廢除了⁸⁷。又《隋書》云：

自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⁸⁸

⁸² 于豪亮，〈從雲夢秦簡看西漢對法律的改革〉，頁 150 至 151。該文中將「沒為官奴婢」等同收孥，實則不確。

⁸³ 《漢書·食貨志下》，卷 24，頁 267 至 268。

⁸⁴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卷 1 下，頁 37 云：「（建武六年）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顯示王莽時沒入奴婢者，為王莽一朝之舉。

⁸⁵ 《三國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魏書·盧毓傳〉，卷 22，頁 317。

⁸⁶ 《三國志·魏書·高柔列傳》，卷 24，頁 337。

⁸⁷ 《晉書·刑法志》，頁 238 云：「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

⁸⁸ 《隋書·刑法志》，卷 25，頁 345。

其中「死罪其重者」一句過於模糊，魏晉時期死刑有三等，「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⁸⁹，死罪重者的妻子與兒女以補兵受罰，也不像漢代沒入為官奴婢，顯然這是時代背景所致。

至於後漢時期，雖然屢有「沒入」之事⁹⁰，但是「沒入」者可能來自於收孥以外的規定，絕不能將「沒入」等同於收孥使用。不過《三國志》有一段記載，頗使人以為後漢復行收孥，其云：

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

鍾繇雖然指出「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但是這裡的「罪人」到底指哪種罪刑的犯人，並無明確說明。漢武帝初即位，「赦吳楚七國孥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⁹¹ 吳楚七國謀反，首事者當以謀反大逆無道論之，案律應夷三族，但是景帝顧慮到他們宗室身分的背景⁹²，因此只將其妻子、兒女沒入為官奴婢。可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者，不能肯定就是收孥所致。而且鍾繇所引的漢律，並非條文的內容，只是他根據漢律所作的一項概括性引述，指稱的範圍過大，目標也不明確。

相反的，從一些案例中，可以確定收孥未再執行過。關於此點，于振波已經在文章中舉出兩個案例說明此事，一是發生在光武帝時的沘陽人趙堅殺人案，趙堅論及死刑，但未收其妻。二是大約發生於順帝時期的安丘男子毋丘長

⁸⁹ 《晉書·刑法志》，卷 23，頁 239。

⁹⁰ 例如《後漢書·安帝紀》云（安帝）永初四年（110）正月乙亥，詔曰：「自建初以來，諸詆言它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又如《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卷四，云：「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

⁹¹ 《漢書·武帝紀》，卷 6，頁 49。

⁹² 于振波，〈收孥法的變遷〉，頁 436 認為收孥法廢除之後，仍在一定程度內實行，主要是針對宗室成員等有特殊身份的人犯有「大逆不道」之類的重罪的一種優恤政策。但是，將觸犯「大逆不道」的罪犯妻、子，改以沒入官奴婢論處，只是一種對於身分性階級的優待，其論罪時並非是依據收孥而沒入其妻、子。

殺人逃亡案，同樣論及死刑，其妻也未被收孥⁹³。此外還可以補充 1. 文帝十三年(167 B.C.)，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受肉刑，其女緹縈上書自稱「願沒入爲官婢」⁹⁴。漢初肉刑乃配合城旦舂使用，故淳于意所論之刑必在完城旦以上，而緹縈甘願沒入爲官婢，顯然緹縈不因父親受肉刑而遭收孥。此收孥廢除後十三年之案例。2. 後漢時，陳臨爲蒼梧太守，「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⁹⁵。報父仇而繫獄，顯然是被論以死刑。既是死刑，也不見收其妻子。3. 《晉書》記喬智明的部人張兌爲父報仇，但是「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⁹⁶，可見丈夫有殺人之罪，妻子仍未被收孥。藉此，收孥自從漢文帝廢除以後，終兩漢之世不再復行，此點應可確定。

結 論

漢代親屬連坐法中，收孥只是其中的一種，它的特色在於連坐的親屬範圍不像夷三族那樣的廣，只限於正犯的妻子與兒女，而且正犯的罪刑也不必然是死刑，而是從完城旦、鬼薪以上到死刑之間。連坐的妻子與兒女也不像夷三族那樣要棄市，族誅那樣要徙邊，而只是將他們沒入官府爲收人（官奴婢）。親屬連坐範圍之所以有這樣的差別，完全取決於正犯的犯罪類型及量刑的結果。

收孥未見於出土資料，但張家山漢律有〈收律〉之名，兩者的關係未見學者討論。收孥最早見於《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變法時訂下收孥之規定，漢文帝元年才遭廢除。睡虎地秦律已有收之規定，爰及漢初已成〈收律〉之篇，故收孥與〈收律〉曾經同時存在。收孥之收者在人，〈收律〉之收者不但有人，還包括家中財物，此收孥與〈收律〉之最大差別。收孥起源早於〈收律〉，所收也僅限於妻子與兒女，就收的發展過程而言，收孥的內容較爲簡單，應是〈收律〉的早期形態。睡虎地秦律的收已經擴及財物的範圍，顯然是擴充收孥之後的發展。收孥與〈收律〉雖然並存一段時間，但兩者並不衝突，收孥強調其中「人」的部分，其法律根據仍源於〈收律〉。

⁹³ 參見于振波，〈收孥法的變遷〉，頁 436。其中趙堅殺人案見《後漢書·鮑永列傳附子昱》，卷 29，頁 455 唐李賢太子引《東觀記》。毋丘長殺人逃亡案見《後漢書·吳祐列傳》，卷 64，頁 952。

⁹⁴ 《史記·孝文本紀》，卷 10，頁 158。

⁹⁵ 《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8），〈人事部·謳歌〉，卷 465，頁 2137 引謝承《後漢書》。

⁹⁶ 《晉書·良吏列傳·喬智明》，卷 95，頁 636。

〈收律〉規定沒收的條件以罪刑等級為標準，正犯的量刑必須在完城旦、鬼薪以上，而收的對象包括家中成員與家中財物。不過正犯的身分階級、犯罪類型，以及妻子、兒女在家中的身分地位等，都是影響當收與否的因素，收的條件相當複雜，但規定的很仔細。被收之人稱為「收人」，性質類似於刑徒中的隸臣妾，收人以賣給私人作奴婢為常態，所收之財物亦作同樣處置。

《史記·孝文本紀》記文帝元年廢除收孥，廢除之後是否復行，引起兩方討論。從司法案例所見，終兩漢之世，收孥不再復行。只是魏晉時期，收孥的變相形式在某些規定中出現，這些規定被當時視為重典，希望能夠收到「累其心，使重犯法」的效果。

參考文獻

一、史料

- 《詩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十三經注疏本）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
《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史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
《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百衲本）
《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新校本）
《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
《三國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
《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
《隋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百衲本）
《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8）
黎靖德編、王聖賢點校 《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李調元 《勦說》（臺北：世界書局，1982）
王先謙 《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二、專著

- 沈家本 《漢律摭遺》；收入氏著《沈寄簪先生遺書》（北京：中國書店，1990）
程樹德 《九朝律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陳中龍 《漢晉家族法制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5）
富谷至 《秦漢刑罰制度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98）

三、期刊論文

- 于振波 〈收孥法的變遷〉；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研究》第三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于豪亮 〈從雲夢秦簡看西漢對法律的改革〉；收入氏著《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
李均明 〈張家山漢律《收律》與家族連坐〉；《文物》2002年第9期。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角谷常子 〈秦漢時代における家族の連坐について〉；收入富谷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6）
高 恒 〈西漢王朝前期的法制改革〉；收入氏著，《秦漢法制論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
張伯元 〈秦漢律中的“收律”考述〉；收入氏著《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漢簡法律術語零拾（四則）〉；收入《出土法律文獻研究》
陳乃華 〈秦漢族刑考〉；《山東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

The First Research to the Shou-Laws in Ch'in-Han Dynasty

Chen, Choung-Long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kinfolks which are implicated by law in the Han Dynasty, one is the “yi-sna-zu” 夷三族, another is the “zu-zhu” 族誅, the last is the “shou-nu” 收孥. These typ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in their cont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ou-nu which implicated families are not widespread as the “yi-sna-zu”, and it only restricted in the criminal’s wife and children but not the whole family. Moreover, the criminal won’t put to death in every case, but between “wan-cheng-dan” 完城旦 and “gui-xin” 鬼薪 to the death. The implication to the wife and children are not like the “yi-sna-zu” which would be killed, and also not like the “zu-jia” which would be move to the frontier, but confiscated by the government.

It was unable to know when the “shou-nu” began, but it was definitely that the “shou-nu” was never used after the Emperor Wen abolished it. Only in Wei-Jin period, the “shou-nu” appeared in some laws but in different forms. And was believed that it was a stern law .

Keywords : Shou-Law, Shou-Nu, Ch'in-Han Dynasty